



二次大戰期間的香港華籍英兵

著——鄺智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二次大戰期間的香港華籍英兵
作者：鄺智文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格局起變；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都市想像，追求不斷發展；新媒體盛行，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繼續衝擊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資本」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分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香港當前現況，對中國重申香港主權進行切要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6 鄺智文.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鄺智文。2016。「二次大戰期間的香港華籍英兵」。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序言

國共歷史敘述中的「香港保衛戰」與「香港華人」

簡述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華籍英兵

誰是大戰中的華籍英兵？

戰爭期間的平等化與戰後「常態」的回復

結論

檔案資料

參考書目

序言

殖民主義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曾主導香港的歷史書寫，甚至誇大或掩蓋部分殖民地時期的重要史事和特定群體的應有角色（王宏志，2000；蔡榮芳，2001；張少強，2011）。在這樣的權力干預之下，殖民主義史學在編纂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期間的香港歷史之時，一般都以英聯邦軍民在戰爭期間的苦難為主，華人則多被描述為無助的受害者或旁觀者（鄺智文，2014b）。另一方面，華人在保衛香港的戰鬥中「缺席」，向來被民族主義史家視為是英國殖民地政府不能或不願與香港華人合作，死抱種族主義和「以華制華」來維持殖民統治的表現，香港和香港華人在戰爭期間則只能仰賴國民政府的軍隊或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抵抗日本侵略。這套論述不但把大部分香港華人排除在抵抗外敵的歷史之外，更突顯了香港在二十世紀大國衝突中的從屬與被動地位。引申所致，雖然曾有一批華籍英兵參與香港戰役以及其他抗日行動，但除了少數較為著名的人物以外¹，這些事跡鮮被詳細書寫。

然而，香港華人並無真的缺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在歷史書寫層面被忽略而已。自1945年伊始，華籍英兵參與

1 如香港大學畢業生洪榮釗Hung Kai-chiu、英軍服務團的李玉彪Lee Yiu-piu等。

抗日戰爭已屬香港中英文媒體時有報道之事，部分官兵更於戰後由港督親自受勳。他們鮮被歷史記錄下來，主要是由於殖民主義史觀有精英主義傾向使然，既在取材上側重軍官而不重士兵，也在體例上以部隊為書寫主線而不是人物。可是，當時的華籍英兵大部分均為士兵，更被分散到駐港英軍的不同部隊中，部分部隊（如下文提到的「香港新加坡皇家砲兵團」、「香港華人軍團」）在戰後又是沒有恢復，因此他們的事跡往往隱藏在個別英軍部隊的歷史之內而沒有直接的記載（鄺智文，2014b）。這些資料與官方戰史的流通量頗為有限，引用者也是不多，於是乎這些華籍英兵的事跡難免更加鮮為人知。如以皇家砲兵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場官方戰為例，其實是有提到華砲兵的行動，以及英軍軍官在投降前解散他們的經過（Farndale，2002）。可是，香港有部分官方檔案都在淪陷之時散失，包括華籍英兵原有的個人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香港歷史總有無法填補的殘缺地方。幸好，在淪陷期間，華籍英兵曾經要向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再次報到，使得該部隊的檔案紀錄內有部分華籍英兵資料。即使該部指揮官賴廉士中校（Lt. Col. Lindsay Ride）是澳洲人，這些檔案一度輾轉被送到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可是其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 Ride）最終都能把這些檔案副本交給香港記憶計畫（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成為現可查索的檔案資料。就追查華籍英兵的服役經過，現可查索的官方資料還有由英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及香港政府檔

案處保存下來的檔案紀錄。雖然這些檔案資料散落在不同地方，但從中可以清楚看見，當時香港至少有約1,000名香港華人曾加入英軍參與1941年12月8日至25日的香港戰役，部分更於香港淪陷後重入英軍服役，繼續參與抗日行動，甚至遠赴海外作戰。

就此，本文嘗試以華籍英兵²為中心，由下而上地闡述香港華籍英兵參與二次世界大戰的歷程；本文指出國共兩黨避而不談香港華人參與抵抗日軍的緣由，繼而析述華籍英兵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角色、華籍英兵的來源、華籍英兵之間的內部分歧，以及他們在戰後如何跟英國士兵一起向英國和香港政府爭取應有補償，就香港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經歷和角色，增進知識與理解，指出在二十世紀初期華人與英國殖民者並不限於「分而治之」，或單純分權給華人精英進行共治，而是在不同環境與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動態與張馳。

2 皇家海軍早於1860年代已開始在香港以及中國沿岸港口招募華人擔任水兵，他們大多是炊事員，被稱為「管事部」人員（Stewards），但他們的正式地位在1905年才獲得確認。他們亦曾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但關於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行動的史料則相對缺乏。另外，英軍曾於1898年在威海衛租借地成立「華勇營」（Wei-hai-wei Regiment）。該部曾參與義和團戰爭，於1906年解散。

國共歷史敘述中的 「香港保衛戰」與「香港華人」

就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香港處境，現有的中文歷史論述大多認定英人不信任華人，因此沒有允許華人參加1941年12月參與抵抗日軍侵略，最終被日軍擊敗，意味英人若可誠心和華人合作（不論本地華人或國共兩軍），則香港將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國共兩黨以往均以這樣的說法批評英國準備不足，指責英國不信任本想衷誠合作的國民政府及中共，以至不信任華人大眾，導致香港抵抗日人之時幾近孤軍作戰。例如，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後，國軍方面曾流傳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香港戰役期間命令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提早投降，以免國軍進入殖民地，威脅英國的殖民統治（鄺智文，2014b；鄺智文，蔡耀倫，2013）。這種說法不但無視國軍無力突破日軍防線來進行越境救援，更忽略了日軍進攻九龍期間，英軍把本來被安置在九龍馬頭圍的一營國軍釋放，並和國民黨駐港最高代表陳策海軍中將合力維持港島秩序的經過（鄺智文，2014b；鄺智文，蔡耀倫，2013）。

事實上，在香港淪陷後不久，英人不願華人參與防守香港一說即已出現。當時，由於蔣介石希望趁機收回香港，國民政府在政治宣傳上已在中美兩地指責英人對日消極，又不願華人

協助，最終丟失香港。其目的是要香港華人不應對英國抱有任何幻想，推動香港「回歸」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最早提出這種說法的重要人物就是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她在1942年4月19日在《紐約時報》以大篇幅討論「傲慢的英國人」如何在希望抵抗的中國人面前相率向日軍投降。她直指英國任由日本侵華，不但沒有和中國共同禦侮，反而「對紙糊的防禦工事心滿意足」。她又把英軍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戰敗與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在菲律賓的抵抗比較，認為後者能夠繼續抵抗是因為他「平等對待菲律賓人，而且容許菲島獨立」。可是，宋美齡的文章發表不過後數之日，麥克阿瑟已然離開菲律賓，該地美菲聯軍於5月8日同樣正式投降，唯獨有部分美軍轉入游擊戰繼續抵抗（New York Times，1942年4月19日）。因此，正如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向英國外交部報告，宋美齡的文章旨在進行反英宣傳，「消滅我們的在華利益」（FO 371/31704）。其後，國民政府果然要求英國取消所有「不平等條約」，包括租借新界的《展托界址專條》，甚至要求收回香港。

可是，國府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修約談判中，終歸未能迫使英國交出新界或香港，其反英宣傳亦因為戰情有變而要擱置下來。同年，中國左翼記者薩空了出版了自己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初的日記，講述他在香港淪陷時的見證³。在這本名為《香港淪陷日記》的紀錄中，薩空了以自己的遭遇，提出了跟宋美齡相近的觀察（薩空了，1985）：

3 薩空了本人是自1941年開始，在香港為中國民主同盟辦報，並於1943年曾因其左翼背景被捕直至1945年才可獲釋。1949年後，薩空了則曾任新聞總署副署長等職。

「報紙看完，覺得中文報自戰爭爆發後，愈感毫無生氣，消息非譯自公報即譯自西報，沒有一個中文報有記者能隨軍到前線，甚至跟後方軍部接觸的機會都沒有，我們的記者身份證至今沒有領到，可是香港的民眾大部都是中國人，港督八日晚曾廣播要求中英人民并肩作戰，我不知中國人有甚麼機會可以貢獻他們的力量……。」

香港戰役期間，薩空了未能走訪任何軍事會議和行動，明顯使他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頗為不滿。因此。他在1943年版的序言中，對殖民地政府有所批評，但他強調此舉只是「指出自己（盟國的）缺陷」，而且「決不是攻擊」（薩空了，1985）。當時的他亦未有在序言中，提及殖民地政府如何不願和華人合作抗日而招致失敗。可是，中英兩國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定要取得香港的主權後，他即於翌年再次出版他的《日記》，並在新的序言中把上述說法變成全書的主旨。他指出中英兩國雖為盟友，在港華人不分政治背景，均「懷著同仇敵愾的心情」，熱切希望「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群策群力解救香港的危難」，但只有少數進步的英人願意與華人聯手抗日，殖民地政府卻「從戰爭一開始就顯出怯懦和猶豫」。因此，在港華人只能盼望祖國的救援，更認為「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救被英國佔領、租借的中國土地，這是何等揚眉吐氣的事」。可是，殖民地政府「既不敢武裝中國居民御敵，又不敢聯合中國軍隊抗日」，最後「只好舉白旗投降」（薩空了，1985）。

由此可見，薩空了想要追究歷史責任，也在趁機宣傳，指殖民地當局在戰時香港無心戀戰，枉費了華人有作戰的決心和熱誠，但亦同時意味中國方為香港華人的真心保衛者，香港華人也希望得到中國救援。即使有此明顯的政治宣傳色彩，此書提供的記述既被日後不少史家視為研究香港戰史的原始資料，其說法也成為這些史家描述戰時香港的基本論調。例如，1988年出版的《香港史話》，即有如此記載（金應熙編，1988）：

「早在1939年，當時的中國政府曾經提出協同防衛香港的建議，但被英國拒絕了。香港同胞的抗日情緒一直都很熱烈，但是如何動員他們的力量，港英當局在備戰中卻很少考慮的。」

其他的內地史學文獻對於戰時香港，也大多先寫宋慶齡等親共左翼人士如何在香港進行援華活動，或中共在港機構（「新四軍辦事處」）如何跟殖民地政府就抗日問題爭拗，然後著力記述港英當局如何跟倫敦政府一樣奉行「綏靖主義」，不但對日本侵華態度消極，更強加攔阻中共的民族救亡運動。1997年7月出版的《香港：從被割佔到回歸》仍是如此指責當時英國的軍事政策（楊元華，鮑炳中，沈濟時，1997）：

「由於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英國感到來自德、日兩方面的威脅。在權衡與決策中，英國政府決定在東方繼續對日綏靖，對中日之間的戰爭執行所謂『中立』的『不干涉』政策，保住英國在華利益。暗中卻在不破裂英日關係的前提下，支持中國的抗戰，以便使中國能有效拖住日本，減輕英國的壓力。」

「英國政府的這種兩面政策，香港當局是心領神會的。因而當中國人民利用香港這塊土地掀起抗日救亡運動時，港英政府一般採取不干預的方針；而當來自日本的壓力增大，或者港英政府認為會引起日本方面抗議時，港英當局就會出面干涉、鎮壓。香港華人的抗日熱潮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的。」

可是，內地史學文獻偶爾又會在敘述上，不自覺地出現矛盾的記述。例如，在《香港：從被割佔到回歸》中，竟然一度頌揚：「戰前參加香港義勇隊的不少華人，也和駐港英軍一道，勇敢地投入了力量懸殊的香港保衛戰之中」（同上），但僅在往下一頁接著提出：

「由於港英當局在與中方合作抗日問題上顧慮重重，既不允許武裝在港華人，又不願意讓中國軍隊分擔港島防務。即使開戰之後，英方仍沒採取任何措施來動員、武裝華人參戰，擔任正面防禦的只有萬餘人的英、加和以外籍人士為主幹的香港義勇隊，廣大中國人民仍然被排斥在抗戰之外。」（同上）

沿著這樣的政治宣傳/歷史敘述路線，香港淪陷後，香港華人也多被內地史學文獻寫成全在日軍鐵蹄下受盡苦難，願意反抗者只能加入了中共東江縱隊屬下的港九獨立大隊，在中共領導下在香港繼續抵抗。於是，部分文獻在記述港九獨立大隊時，則常有提及港九獨立大隊的「本土」性質。例如，1994年出版的《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如此寫道（賀弘景，1994）：

「在日軍占領香港期間，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侵略者的鬥爭。聞名遐邇的東江游擊隊港九大隊，就是當時香港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軍的傑出代表。」

簡言之，在政治宣傳上，國共雙方均聲稱在香港領導華人抗日，並批評倫敦和港英當局消極無能，幾乎成為日軍侵華的幫兇。在歷史書寫上，民族主義史家強調殖民者沒有動員被統治的華人，以揭示英國如何只顧自身的統治利益，導致香港同胞成為日軍侵略下的受害者。故此，把現已被這些歷史書寫掩蓋了的香港華籍英兵事跡書寫出來，既是要對知識/權力如何干擾史學作出反省，也是要重新認識香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有多樣化的歷史主體。

簡述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華籍英兵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 1860）以降，英國陸軍已開始僱用華人協助作戰。當時，英軍在香港成立「廣東苦力團」（Canton Coolie Corps），招募了近4,000名來自香港及廣東省的華人為英軍擔任後勤人員。他們在效力英軍之時得到了不少英國軍官賞識，並認為這些華人苦力兵應有更大的軍事潛質。因而，在1870年代初期，英軍曾想在香港成立華人部隊，但由於英國陸軍司令（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y）劍橋公爵（Duke of Cambridge）反對而作罷（鄺智文，2014a）。後來，英國陸軍部需要節省開支，遂於香港、新加坡，以及毛里求斯等地徵募少量當地人參軍，華籍英兵終在1891年正式出現香港，並被編入「香港水雷砲連」（Hong Kong Submarine Mining Company）。至十九世紀末，香港水雷砲連共有約70名華籍英兵，他們曾參與1899年英軍佔領新界的行動，以及1900年八國聯軍救援北京使館區的戰鬥。1905年，香港水雷砲連解散，華籍英兵被編入「第40要塞工兵連」（40th Fortress Company），改稱「華工程兵」（Chinese sappers）。可是，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負責駐守香港，未有參與戰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皇家工兵屬下有約50名華工程兵，海軍則有約百名華人水兵。在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華人開始加入香港的民兵部隊「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義勇防衛軍屬於英國陸軍中的民兵部隊（Territorial Army），與華工程兵等正規軍（Regular Army）不同，由業餘士兵組成，官兵於假日進行訓練，並於每年定期進行演習。香港的義勇防衛軍最初在1854年成立，當時正值克里米亞戰爭，加上九龍被天地會短暫佔領，而且香港附近有不少海盜出沒，因此香港政府在輔政司威廉堅（William Caine）領導下組織義勇防衛軍，由在港英籍僑民充任士兵。在1920年代，部隊有數百名官兵。初期加入義勇防衛軍的華人大多為社會名流，在部隊中負責支援和後勤工作。至1941年，義勇防衛軍的各連隊不但兵種有別（如步兵連、機關槍連、砲兵連等），其兵員亦按族群分開，頗有「分而治之」的意味（Bruce，2001）。

1936年，為應付德、日等國在歐、亞的威脅，英國陸軍開始擴充，並增加殖民地士兵的人數。工兵中尉高活（Lt. Michael Calvert）於同年被派往廣州學習廣東話，然後到香港招募華工程兵。但他發現華工程兵在當時「與苦力無異」。故此，他要華工程兵接受戰鬥訓練，成為具作戰能力的士兵而不是純粹提供苦力的輔助人員。直至駐港英軍於1937年英王佐治六世壽辰會操之時，華工程兵亦已不再作為輔助部隊排在最後，而是排在英軍工兵與各英軍步兵營之間，可見駐港英軍對這個部隊頗為重視。高活在其回憶中特別提到此舉「嚇了不少

人一跳」，同時使「華人感到非常鼓舞，因為他們覺得華人有份為防守香港出一分力」(SOAS Special Collection, 1982)。

中日戰爭在1937年爆發後，英國需要盡快加強香港防務。由於高活的華工程兵得到駐港英軍司令稱許，其他英軍駐港部隊紛紛仿效。同年，駐港第22野戰工兵連(22nd Field Company, Royal Engineers)開始招募華工程兵，駐港皇家砲兵部隊開始徵募「華砲兵」。到了1941年中，香港已有近千名華籍英兵或水兵服役或正接受訓練(鄺智文, 2014a)。與此同時，由於日軍威脅日大，香港義勇防衛軍亦招募了更多華人入伍，並進而成立由歐亞混血兒組成的第3連(3rd Company, HKVDC)、華人組成的第7連(7th Company, HKVDC)，以及華洋士兵混合組成的砲兵連(Banham, 2005)。就連部分香港大學學生亦有加入由港大醫學院教授賴廉士(Lindsay Ride)率領的防衛軍野戰救傷隊(Field Ambulance, HKVDC)。1941年9月，在英國陸軍部允許之下，第一支由香港華人組成的正規步兵團隊「香港華人軍團(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終於正式成立，並於10月開始招募五十名士官。華人的反應也見理想，僅在招募首日已有數百人應徵(鄺智文, 2014a; 《工商日報》，1941年11月4日)。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十八日後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雖然以往關於香港戰役的書籍均鮮有提及這一千多名華籍英兵，但他們確實參與過所有主要戰鬥。日軍於

18日登陸香港島時，由歐亞混血兒組成的義勇防衛軍第3連在負責駐守黃泥涌峽的各個機關槍堡和野戰陣地。日軍從英軍防線的缺口闖進黃泥涌峽，遭到包括防衛軍在內的守軍激烈抵抗。雖然守軍敗陣，但不可否定的是，防衛軍在這場黃泥涌峽戰鬥及其後的赤柱戰役都是屬於重要的抗日隊伍，其經歷亦因為防衛軍在戰後有完整的團隊歷史而廣為人知（鄺智文，2014a；鄺智文，蔡耀倫，2013；Bruce，2001）⁴。由於資料所限，其他華籍英兵曾是如何參與歷次戰鬥已難全面掌握，只能從高活在受訪之時提供的口述資料得知，華工程兵曾參與英軍在新界的爆破工作，並於日軍登陸港島後被當成步兵調遣，參與增援黃泥涌峽的戰鬥（SOAS Special Collection，1982）。新設的香港華人軍團在18日剛被調到黃泥涌峽附近駐守之時，亦有跟日軍駁火兩日之久（鄺智文，2014a；CAB 106/88）。可是，該部隊其後被日軍擊潰，死傷者包括大部分英籍軍官和士官，以及近半華籍英兵。華砲兵由於被分配在各部隊，其經歷則各有不同。例如，加入高射砲隊者雖有參與戰鬥，但少有和日兵正面交戰。相反，隸屬第965防衛砲連（965th Defence Battery）的華籍英兵，在12月24至25日的赤柱戰鬥期間，負責操作反坦克砲和探射燈，幾乎全軍覆沒（鄺智文，2014a: 102-103）。就此，若非尚有英軍服務團在戰爭期間對生還的華籍英兵作出調查，則他們的戰鬥經歷很可能永遠被遺忘。

4 現時在香港海防博物館仍有一專門紀念防衛軍的展廳。

到了駐港英軍投降之時，英籍官兵大多命令華籍英兵脫去制服離開，因為當時流傳日軍會殺害穿著英軍制服的華人。雖然如此，仍有少數華籍英兵被日軍俘獲，但他們也大多沒有被殺而只是被送到戰俘營，並終在1942年下半年陸續獲釋。淪陷期間，約有700名逃過被俘或從戰俘營逃走的華籍英兵、水兵，或後勤人員，前往中國大陸向總部設立在惠州的英軍情報組織英軍服務團報到。由於報到者來自華工程隊、華砲兵隊、華人軍團、防衛軍，以及正規和後備海軍等多個部隊，甚至包括政府文員，警察等，因此英軍服務團先把有作戰經驗者編成為「中國部隊」（China Unit），然後把他們重新訓練為步兵。其餘士兵則於領取薪餉後就地解散，或留在英軍服務團之內，在華南和香港繼續進行地下抗戰或支援工作（鄺智文，2014a）。

1943年夏，英軍準備從緬甸反攻，遂決定把中國部隊送到印度支援，並派出一名英軍軍官率領，士官則由有經驗的華籍英兵充任。初時，當地英軍只把華籍英兵當成勞工隊使用，使他們頗為氣餒，但部隊「巧遇」當時已升任印度步兵第77旅（77th Indian Infantry Brigade）旅長的高活。華籍英兵們要求高活率領他們到前線參戰，高活遂改編部隊為「香港志願連」（Hong Kong Volunteer Company），並使之成為第77旅的司令部警衛連，隨高活到緬甸作戰。1944年3月，香港志願連跟第77旅一起成為英軍「殲敵」（Chindits）部隊的一部分，由滑翔機運載到日軍戰線後方進行破壞任務，並在緬甸叢

林作戰數月，主要負責破壞、伏擊，以及保護陣地等任務，直至8月協助中英聯軍攻佔日軍據點孟拱之後，香港志願連才跟隨第77旅撤退（WO 172/5057）。在一張關於這個部隊的罕見照片中，有幾位香港志願連的士兵在緬甸舉著「乘順風車到香港」（Hitch-hike to Hong Kong）的標語合照，使我們得以一窺部分士兵當時視香港為家並為之作戰的心態⁵。

香港志願連回到印度休養不久，其他英軍部隊已然希望徵用這些有作戰經驗而且擁有亞洲人面孔的士兵，以支援反攻馬來亞的行動，其中能操流利英語者更成為各部爭奪對象。英國東南亞總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遂把部隊派到馬來亞擔任偵察、聯絡、以及和當地華人溝通等任務。其後，英國殖民地部曾要求陸軍部協助，通知東南亞司令部把香港志願連召回，使它得以參加從投降的日軍接收香港的行動。高活特別支持此事，認為：「香港華人在我們麾下作戰的宣傳效果不容小覷，尤其我們現在正承受戰後交還香港的壓力」（CO820/60/4）。可是，由於戰爭在1945年8月結束，香港志願連未及被調到參與光復香港的行動。到了該年年底，除少數人員外，在英軍服務團和香港志願連服役的華籍英兵才可陸續回港，且有部分繼續參加新成立的「香港工兵連」（Hong Kong Pioneer Company），其餘則選擇退役（HKMSC，1997）。

5 Hong Kong Volunteers. Retrieved on Jan 29, 2016 from <http://www.chindits.info/Photos/wciHK2.html>

誰是大戰中的華籍英兵？

雖然史學文獻少有談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華籍英兵，但如前述，他們的個人資料亦有部分得到保存。按現存資料顯示，香港淪陷至1943年初，至少有197名曾向英軍服務團報到的華籍英兵和後勤人員，其中132人屬於正規軍（Regulars），其餘均為英軍在香港以合約形式僱用的後勤人員或啟德機場的警衛，義勇防衛軍的士兵則沒有相關記錄。在報到時，他們都被要求填寫表格，提供他們的背景資料和戰時經歷，例如籍貫、年齡、語文能力、薪酬、所屬部隊、戰前職業、作戰經過、淪陷後的生活，以及如何從香港逃到中國大陸等。本節嘗試分析這批資料，並借助其時人的回憶錄和其他史料，簡述華籍英兵的主要來源、階級狀況及社會背景。

高活於1936年到港徵募華工程兵時，發現部隊內有不少現役的華籍英兵是19世紀香港水雷砲兵的後人。由於工作穩定，條件相對優厚，數十年來香港的華工程兵已在少數低下階層家庭之內，成為一代接一代的世襲職業。可是，在1920至1930年代，部隊紀律日壞，甚至有黑社會滲透。例如，在1921年之時曾有一名香港水雷砲兵因參與三合會而被罰款港幣50元（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1年12月3日）。

四年後，更有四名水雷砲兵和幫會中人毆鬥而被刺傷（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5年2月21日）。有見及此，高活在招募華人入伍之時，特意整頓部隊，去蕪存菁，透過打破華工程隊中的家族壟斷來吸納新人。由於當時香港社會，低下階層的工作環境一般都比較惡劣，高活最終亦得以輕易招來不少合意的新兵，應徵人數之多也可讓高活「選擇有特別技能的人」（SOAS Special Collection，1982）。可是，即使有新兵加入，仍有不少士兵是水雷砲兵的子侄和家人。曾來港檢閱駐港英軍和華工程兵的遠東三軍司令（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樸芳空軍上將（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曾一度於訓話中提到：「我知道您們的前輩有不少是您們的父親或親戚，他們在五十年來以其盡忠職守聞名於世，我確信你們在平時和戰爭時期均可秉承這個傳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41年4月9日）。

現有資料未能顯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多少華工程兵是香港水雷砲兵的親戚或後人，但資料顯示77名有報到的華工程兵中只有13人有填上「戰前職業」一欄，其中大多曾於船塢工作，或曾任「技工」、「電工」等，只有一人是學生，另一人是文員，因此，當時的華工程兵大部分都應是來自低下階層的勞苦大眾。部分仍然在世的華籍英兵同樣指出，這些華籍英兵大多都是為了三餐溫飽與穩定收入才加入英軍⁶。

6 「【二戰華籍英軍】(9)盧樹增(上)」、「【二戰華籍英軍】(5)李惠財(上)」。

英國軍方的檔案資料則顯示，他們的平均年齡在25.9歲，其中有四人年齡為35歲以上，他們早於1920年代已經參軍。如不把他們計算在內，有填寫年齡者的平均年齡為25歲，服役平均時間為46.9個月，可見大部分士兵可能在成年之後不久即已參軍。部隊77人中有64人填上「籍貫」一欄，據此籍貫資料顯示來自花縣兩人、平海一人、淡水一人、三水一人、中山一人、台山一人、伍華兩人、東莞三人、南海四人、恩平兩人、海豐一人、梅縣一人、清遠三人、惠州五人、惠陽五人、番禺七人、順德兩人、新會三人、瑞興兩人、增城一人、興寧四人，以及寶安四人。在「籍貫」一項，填上香港者有六人，約佔百分之十。因此，來自華人下層階級的華工程兵大多仍視廣東省各地，特別是靠近香港的粵南地區為故鄉，但亦有人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語言方面，填上此項者有54人，其中52人填上「廣東話」、兩人填上「客家話」。在其他語言上，有28人填上「英語」或「少許英語」、有26人填上「客家話」，只有七人填寫懂得「國語」(EMR-1D-07)。觀乎率領華籍英兵的英籍軍官均懂得廣東話，而且參與實際指揮的華人士官亦懂得英語和廣東話，因此，有理由相信，英語和廣東話應為這些華籍英兵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主要語言。

當駐港英軍的皇家砲兵於1937年也開始招募華砲兵之時，從相關檔案資料可見，這些華砲兵大部分都跟華工程兵一樣，來自社會中下階層，他們的戰前職業多為船塢工人或店員（*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37年5月6日）。在報到的59人中，有39人填寫了自己的歲數。就此來說，他們的平均

年齡只有23.9歲，服役時間亦只有20.1個月。他們只有17人填寫語言能力，所有人的母語均為廣東話，約有三分一人同時能說客家話，會說英語和國語者僅有五人和四人，另有一名印度華僑能說烏爾都語（EMR-1D-08，c.1943）。就這些砲兵和工兵的籍貫和語言來說，有一點值得留意，即所有報稱籍貫為香港的17士兵中，無一人能說廣東話以外的語言。據此可知，這些華籍英兵的生活圈子主要是香港或廣東省。

至於1941年11月成立的香港華人軍團，在招募華人之時則只有46人入伍。這支華人軍團的構成也明顯和華工程兵和華砲兵有所不同。正如當時報紙提到數百名應徵者中包括「洋行職員、潔淨局苦力、新界工農兩等鄉民，與及青年學生等」（《工商日報》，1941年11月4日）。由於這些最先入伍的士兵將成為部隊的士官，即軍官和士兵之間的橋樑，以及部隊實際運作時的骨幹，因此英軍對他們的要求甚高：「規定身高五呎七吋（約170厘米），體重一百二十五磅，胸圍三十四吋者為合，若智力體格均具相當水準，方予取錄」（《工商日報》，1941年11月4日）。雖然無法從現有資料查找精確數字，但有部分華人軍團的士兵（士官）起碼來自中上層華人精英的子侄。例如，華人軍團士兵羅炳倫（Lo Ping-luen）是高級華人公務員陳國榮⁷的侄兒，其表兄弟陳瑞麟（Chan Sui-lun）則於香港大學就讀，並就在讀期間加入了香港義勇防衛軍的砲兵連。另一名士兵湯寶興（Thong Po-hing）⁸戰前亦為商行職

7 陳國榮本人（Chan Kwok-wing）於1941年官至入境事務處首席文案(Chief Clerk)。

8 筆者曾在拙著《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一度誤把湯寶興和華工程隊的士官沈來興混淆，現於本文作出更正。

員，兼後備警察（Police Reserve）中的射擊高手，曾於1936年射擊比賽中擊敗所有洋人警員，獲得第二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36年11月30日）。這支華人軍團共有20名士兵曾向英軍服務團報到，他們的平均年齡為22.1歲，部分戰前為中學生，亦有來自商行者，報到者中有13人填上「籍貫」一欄，包括中山一人、台山一人、南海一人、梅縣三人、清遠一人、番禺三人、鶴山一人，香港則有三人，同時亦有兩人報稱來自倫敦。他們所有人均以廣東話為母語而且近半能操英語，其中的華僑亦懂得客家話、馬來語，以及烏爾都語，只有五人能說國語（EMR-1D-05，c.1943）。比起華工程兵、水雷砲兵、華砲兵和華人軍團，義勇防衛軍中的華籍英兵明顯有不少都是來自較為富裕的家庭，他們的父輩也多為專業人士或洋行人員（鄺智文，2014a）。可是，由於資料不足，未能對他們的來歷和背景進行詳細討論。

戰爭期間的平等化與戰後「常態」的回復

由於戰爭所需，英國軍人終要與華籍英兵一同作戰，出生入死，對兩者之間的統屬關係、階級關係和種族關係，均帶來衝擊，甚或增進相互認同。例如：曾有分招募香港軍團士兵，香港淪陷後逃到中國的英印軍醫官史潔雲上尉（Capt. Douglas Scriven）在香港華人軍團的作戰日誌中寫道：「我曾訪問邁亞少校（香港華人軍團司令）等人及其他部隊的成員，他們都一致讚賞這些新兵的沉著勇氣……如這個團隊有足夠的時間成為完整部隊，1941年香港戰役將是它引以為傲的戰功」（CAB 106/88）。英國陸軍部在香港淪陷後所發出的聲明亦特地提到華籍英兵的貢獻：「陸軍委員會特別對有華人英勇地在保衛香港的戰鬥中犧牲感到遺憾。在[香港]島戰鬥中各族裔展現的合作和勇氣將於其他地方和情況延續下去，直至最後勝利」（FO 371/31628）。

在淪陷期間，有華籍英兵協助被囚於戰俘營內的英軍官兵逃走，使他們在軍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也使英人和華人官兵之間增加互信。防衛軍醫官賴廉士中校（Lt. Col. Lindsay Ride）所以能逃出戰俘營，就是因為其華人助理李玉彪的協

助。賴廉士其後在華南成立地下抵抗組織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部隊主要以曾於香港服役的英軍，以及華籍英兵組成。由於英人難以親身潛入香港，因此大部分前線情報工作只能依賴華籍英兵進行。李玉彪曾於潛入香港時被日軍逮捕並遭受酷刑，但他堅拒向日軍透露任何線索，因而獲得軍事勳章（Military Medal），並突破華人不能成為軍官的限制，在戰爭結束時已官至上尉（London Gazette, 1942）。華籍英兵亦因為他們的功績而變得更加敢於向英軍爭取更多福利。例如，一名曾參與赤柱戰役的華砲兵士官於1943年1月代表其他士兵投訴被一名英印軍上司欺壓的問題，他不但未被懲罰，反而連升兩級成為上士（EMR-1D-08, c.1943）。

然而，這並不代表不同出身、階級，以及種族的士兵都被混合編成在同一個部隊內之後，華人面對的身分和地位隔閡全然消失。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44年被派到緬甸作戰的香港志願連，該部120多名士兵來自各個華人部隊和義勇防衛軍。可是，出身富裕階層的、或擁有較高學歷的華人軍團和義勇防衛軍士兵跟出身其他階層的華工程兵和華砲兵，在生活和社交上總是繼續格格不入。早於1942年底，賴廉士已注意到這個部隊內的階級和種族問題，指出部分士兵的「生活水平比其他華籍英兵要高」，而且有人對自己的英籍身分非常自傲，成為衝突的源頭（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1942）。

曾率領香港志願連到前線作戰的高活在其回憶錄中對此問題未有明言（Calvert, 1971）。可是，他在1983年再次接

受英軍殖民地部隊歷史研究者韋德（Shamus Wade）的訪問時，卻特別提到志願連士兵因為階級有別而出現衝突（SOAS Special Collection，1982）：

「我要求他們加入我的部隊時，發現他們既有客家人，又有廣東人，更有義勇防衛軍的中英和中葡混血兒……有部份士兵年紀較大，又胖又弱。他們又拒絕和比較像「咕哩（Coolie）」的華籍英兵（意指那些來自低下階層的工兵和砲兵）在同一部隊服役。因此，我除了編成一個旅部警衛排（Brigade defence platoon）外，更設立另外一個工兵排，由他們駐守主陣地（他們亦有作戰！—此為訪問紀錄原文）……有時，某些志願連士兵更會說：『我不做這些工作，我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我社會地位較高……。』」

雖然部分香港志願連的士兵因為種族與階級問題不時出現衝突，但在戰爭期間，指揮他們的英國軍人於用人的層面，往往沒有計較種族與階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印軍司令部准許高活提名五名華人參加士官晉升軍官的面試。最終，林惠祺（Lam Wye Kee）和鄭治平兩人通過，並於1945年成為上尉（鄺智文，2014a）。在這五人中，林、鄭、湯寶興，以及另外一名面試者均為華人，另一人為混血兒。

可是，到了戰後初期，從英軍處理退伍軍人的做法來看，階級和種族的分野在軍方政策上再次出現。當時，不少英籍和混血兒防衛軍士兵剛在戰俘營渡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生活，香港政府自然要考慮如何安置和賠償他們。在1945年9月，軍

政府即開始進行解散防衛軍的工作，並把戰時薪金全部發放（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ongkong Telegraph，1945年9月29日）。同年12月，軍政府的總民政主任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在發給殖民地部的報告中抱怨道：「這個社會為防衛軍付出的成本使我大為震驚。自1941年以來，防衛軍已差不多花去近20,000,000元（港元）」（HKRS 163-1-179）。與此同時，華工程隊、華砲兵、以及香港華人軍團的士兵則有兩種安置辦法。其中希望繼續服役者被編入「香港工兵連」（Hong Kong Pioneer Company），該部其後演變成「香港陸軍服務團」（Hong Kong Military Service Corps）。部分士官成為部隊中的教官，其中數人更獲得多次受勳。這些部隊中的官兵亦可加入政府工作，例如海關、警隊等（鄺智文，2014a）。可是，英軍在戰後初期恢復了部分華洋分隔的政策，例如，在軍營裡面，華籍英兵、英軍士兵、英國軍官要使用不同廁所。所有華人軍官亦全被退役，最高級的華籍英兵只能成為士官（鄺智文，2014a）。即使駐港英軍其後再度考慮提拔華人為軍官，他們亦先考慮香港大學的畢業生。直至英軍發現港大畢業生根本不願從軍，英軍才不得不開始提拔華人士官為軍官（HKMSC，1997）。大部分華洋分隔的政策直到1970年代才完全解除。

雖然英國軍方在戰後部分恢復了種族和階級的分別待遇，但不同族裔與階級的官兵之間的關係已因曾經共同作戰而衍生一定的集體意識。戰後，一眾老兵要向殖民地政府爭取應有權益，華籍英兵與關心此事的英兵即就此再次走在一起，合力對

抗政府的新政。事緣1947年2月，殖民地政府向立法局提出《香港國殤紀念基金條例》（War Memorial Fund Ordinance）的草案，並於條例通過後成立基金，協助所有在戰爭期間因傷至戰後不能工作的官兵或陣亡者的家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7年2月14日）。「香港國殤紀念基金」的設立，理論上「無分階級和國籍」，並確保所有防衛軍士兵均能受惠，包括正規海軍、陸軍、華籍英兵等等。可是，基金自1970年代起曾被多次批評，例如：撫卹金追不上通脹、沒有提供免費醫療、部分成功逃脫的戰俘竟被拒絕申請，直教不同階級和國籍的老兵都有不滿。概括來說，當時的基金申請者包括華籍、英籍、葡籍、印籍、或混血兒，他們的主要代表是在新加坡被俘的英兵艾華士（Jack Edwards）以及在戰爭期間曾任軍官的鄭治平（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7年5月18日；1977年5月25日；1978年10月19日；1979年5月22日；1980年8月21日；1981年9月1日；1982年8月14日；1983年5月22日；1984年11月14日；1992年1月13日）。高活亦有為其舊部嘗試向官僚機構爭取，更提到來自低下階層的士兵得到較富裕的戰友們的聲援。1982年，他回港探望曾經參加緬甸戰役的士兵後，向韋德提到（SOAS Special Collection, 1982）：

「在1936年，全港只有華工程兵是華籍軍人，他們當時根據《皇家薪餉規定》（Royal Warrant of Pay）支薪，他們的兵籍亦有紀錄。這些都是他們最為官方的身份證明。可是，他們並不被當作是英國士兵，因此不能拿到英國軍餉（以及其他福利）。他們到現時仍頗為擔憂，而且忿忿不平。」

「我嘗試聯絡總督和駐港英軍司令，但他們都拒絕見我。我只能繼續為他們(華籍英兵)爭取，但問題非常糾結。其後，政府尚算照顧他們，但他們被雜混在分成英人、華人、以及混血兒的防衛軍之中。他們(防衛軍老兵)不少都是來自商人階級，要他們和我的華籍英兵（指華工程兵）混在一起對他們而言有失身份，幸好他們願意屈就。」

倫敦與香港政府和軍方則顯得頗為官僚，直至1980年代末期情況才因為傳媒持續施壓而有所好轉，例如士兵可享的津貼終於有所增加，但不少老兵當時已經離世。

結論

綜上各節，可見香港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不僅在等待祖國或英國拯救的受害者。所謂英人不信任華人，不與之共同防守香港一說，是國民政府在香港淪陷後為收回香港主權而特地建構出來的反英宣傳。這套論述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標準批判英國殖民者，旨在揭示殖民統治不許華人參與的本質。其後，此說在知識/權力層面於1980年代再次出現，蓋因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要重申香港主權之故，結果，此說進一步成為內地中文歷史著作中的基本史識。可是，此說掩蓋了歷史的複雜動態，特別是香港華人在二次大戰之時曾經扮演什麼角色，以及有過什麼事跡。

透過現有的殘存資料，從對這一闕歷史空白作出填補，本文嘗試把華籍英兵帶回歷史舞台之同時，本文也在反省英國殖民主義在香港曾有什麼真實的歷史走向，被人遺忘的重要片斷。先從殖民者來說，英人試圖按種族與階級施行的「分而治之」，原來決不可以一以貫之，相反他們的殖民政策總有時勢使然的部分，也有因地制宜的部分，需要在不同時刻跟不同的種族和階級合作。就受殖者來說，香港華人，無分階級，也

同樣可在不同時刻，因應不同的個人生活考慮及集體的歷史局勢，主動接受英人的殖民支配，好像本文分析的不同華籍英兵那般可為英人效命。因此，實際的歷史和個人經歷遠比殖民者或民族主義者容許的陳述更為雜亂。英國殖民者和華人受殖者在香港曾經並肩作戰，有過合力抗日的時刻，這些一同出生入死的共同經歷也理應屬於殖民地歷史記憶在香港延續下去的重要部分之一。

檔案資料

CAB 106/88: *'Report on the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 in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1941 Dec.8-25, by Captain R. D. Scriven.'*

CO820/60/4: *'Hongkong Volunteers.'*

EMR-1D-05: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EMR-1D-07: *'Royal Engineers,'*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EMR-1D-08: *'Royal Artillery,'*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FO 371/31628: *'Hong Kong.'*

FO 371/31704: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HKRS 163-1-179: *'MacDougall to Gater,'* Dec 05, 1945.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London Gazette. 1942. No. 35595.

'Lt. Col. Ride to Military Attaché Chungking,' Nov 12, 1942.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SOAS Special Collection. 1982. *'Transcripts of convers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Shamus Wade, Commonwealth Forces History Trust re Hong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mpany, a Chindit Unit of ethnic Chinese who made their way across China to India.'*

WO 172/5057: *'War Diary of the Hong Kong Volunteers.'*

參考書目

-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金應熙(編)。1988。《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少強。2011。「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頁302-330。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賀弘景。1994。《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楊元華，鮑炳中，沈濟時。1997。《香港：從被割佔到回歸》。福州：福建人民。
-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薩空了。1985。《香港淪陷日記》。北京：三聯書店。
- 鄭智文，蔡耀倫。2013。《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鄭智文。2014a。《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鄭智文。2014b。「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編)，《香港•城市•想像》，頁7-30。香港：匯智出版社。
- 《工商日報》。1941。「港府徵募華軍團」，11月4日。
- 「(9)盧樹增(上)」，「(5)李惠財(上)」，《二戰華籍英軍》。<http://ngtingmae.blogspot.hk/search/label/二戰華籍英軍>。查詢日期2016年1月29日。
- 張少強。2014。「香港史與民族主義」，《思想香港》，第5期。<http://www.thinkinghk.org/#!v511-/c1net>。查詢日期：2016年4月13日。
- Banham, Tony. 2005.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Number 3 (Machine Gun) Compan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45: 113-139.
- Bruce, Phillip. 2001. *Second to None: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Volunte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vert, Michael. 1971. *Prisoners of hope*. London: Leo Cooper.
- Farndale, Martin. 2002. *The Far East theatre, 1939-1946*. London: Brassey's.
- HKMSC. 1997. *Dragon Journal: Commemorative Issue*, Hong Kong: HKMSC.
- Hong Kong Volunteers. Retrieved on Jan 29, 2016 from <http://www.chindits.info/Photos/wciHK2.html>

- New York Times. 1942. 'First Lady of the East Speaks to the West,' April 19.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the Hongkong Telegraph. 1945. 'Volunteer Forces,' September 29..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1. 'A Triad Society,' March 12.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5. 'Four Sappers Stabbed,' February 21.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6. 'Revolver Competition,' November 10.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7. 'Chinese Sappers,' May 6.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1. 'Chinese Sappers,' April 9.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7. 'War Memorial Fund,' February 14.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7. 'Gathering support for our heroes,' May 25.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7. 'Our forgotten Volunteers,' May 1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8. 'Grave injustice to war veterans,' October 19.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79. 'Righting a gross injustice,' May 22.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0. 'Liberation Day irony for the hapless ex-PoWs,' August 21.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1. 'Tears flow for the fallen heroes,' September 1.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2. 'Benefits that PoWs receive,' August 14.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3. 'Haggling over a hero's due,' May 22.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4. 'Bitter veterans seek better travel deal,' November 14.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92. 'Ex-PoWs will never forget their comrades who died,' January 13.